

丛书主编 马瑞芳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研究丛书

# 中国文言小说发展研究

王恒展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丛书主编 马瑞芳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研究丛书

---

# 中国文言小说发展研究

王恒展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言小说发展研究/王恒展著.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5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研究丛书/马瑞芳主编)

ISBN 978-7-5328-9089-7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文言小说—小说史—研究—中国 IV. ①I207.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35131号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研究丛书

马瑞芳 主编

中国文言小说发展研究

王恒展 著

---

主 管: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0531)82092664 传真: (0531)82092625

网 址: [www.sjs.com.cn](http://www.sjs.com.cn)

发行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mm×1000mm 16 开本

印 张: 30.5 印张

字 数: 451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28-9089-7

定 价: 85.00 元

---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 0539-2925659



## 总 序

2005年我担任山东大学古代文学学科学术带头人后,考虑到学科自身优势和发展需要,拟组织本学科教授撰写一套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研究丛书。山东教育出版社对此选题很感兴趣,并申报国家“十一五”规划出版重点项目,获得批准。我们特别邀请山东师范大学王恒展教授加盟。历经十年,这套丛书的九部书稿终于集体亮相于读者面前。

为什么选择撰写这样一套丛书?因为此前学术界对于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多侧重于“史”“论”,侧重于思想艺术分析,对小说作为中国古代文学重要文体,如何萌芽、产生、发展、壮大,直到蔚为大观,对各类小说的发展过程、阶段、特点,研究得似乎还不太够。有必要采用多角度、多侧面对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脉络做一下梳理和开掘,总结出一些可以称之为规律性或中国特色的东西。

那么,这套丛书涉及并试图总结出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过程中哪些规律和特色?

一曰中国古代小说的概念、范围、分类。今存文献中,“小说”这个词语最早见于《庄子·杂篇·外物论》:



“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sup>①</sup>小说研究者早就认识到这里的“小说”是指琐屑的言论，指与“大达”形成对比的小道，还不具备文体“小说”的含义。小说在汉代之前尚缺乏独立的文体意义。在漫长的文学发展长河中，随着小说题材的拓展和小说创作艺术的渐渐成熟，“小说”才成为以散文叙述虚构故事的文学体裁的专称。中国古代“小说”一词内涵、外延都相当复杂，既有文学性文体部分又有非文学性文体部分。各朝各代学者对小说做出了各种分类。16世纪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将小说分为六类：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辩订、箴规。后三类就属于非文学性文体。后世学者对文学性小说文体的分类通常按语言形式做文言和白话之分；按篇幅做长篇和短篇之分（中篇小说通常被包含在短篇小说之内）；按内容做志怪和传奇之分，还有更具体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人情小说之分……不一而足。本丛书着眼于文学性文体小说的研究和分门别类的细致考察。

二曰中国古代小说的起源、孕育、滋养过程。考察哪些文体、哪些因素对小说的产生起作用，这一研究较多地集中在先秦两汉语言文学中。先秦两汉并没有产生典型的小说文体，但此时的多种文体如神话传说、历史散文及诸子散文、史传文学甚至《诗经》《楚辞》都给小说的产生以或大或小、或远或近的影响。其中，神话的原型人物、典故、构思，史传文学的叙事笔法和杂史杂传，诸子中的“说体”故事和寓言故事……对中国古代小说的产生起到决定性作用。本丛书对中国古代小说产生做了全面深入探讨，提出一系列新见解。如庄子对中国古代小说家的决定性影响，《诗经》《楚辞》对小说创作的开宗作祖意义等。

三曰中国古代小说唐前史料学探究。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史料是基础，是理清小说产生年代、成就、特点的必备资料，是进行理论分析的前提。汉前小说史料依附于历史、诸子，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小说作为独立的文体跻身于众多文体之中，产生大量小说作品。程毅中先生在《古代小说史料简论》一书中提出：小说作品本身和版本、目录、作者

<sup>①</sup>《庄子集解》，《诸子集成》本，第177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





生平、评论等,都是重要的小说史料。本丛书在对中国古代小说各种发展阶段的重要作品进行探究时,注重考证,注重重要作家生平对小说创作影响的考察,注重第一手资料的收集和剖析,力求“言必有据”“知人论事”。需要说明的是,唐后小说史料十分繁富,由于小说是“小道”的观念,唐后一些极其重要的作家如兰陵笑笑生、曹雪芹的生平往往不易弄清。因而对作家生平的考订应该成为小说史料学的重要内容,如与红学并列的曹学,就是专门研究《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及其祖辈的学问。而用一本书探讨整部小说史史料问题几乎不可能,故本书对唐后小说史料的必要性、兼顾性研究体现在有关书中,小说史料的专门性探究暂时截止于唐前,唐后小说史料的专门性探究,留待此后有条件时增补。

四曰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的发展轨迹和写作特点。中国古代两类最主要的小说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都经历了萌芽、成长、繁荣、鼎盛、衰落阶段,并在各阶段产生了彪炳史册的名著。我们采用通常意义的文言和白话区分法,其实严格地说,不能用“文言或白话”截然区分中国古代许多小说,典雅的《聊斋志异》里有许多生动活泼的民间口语,通俗的《金瓶梅》中也出现台阁对话,《三国演义》则采用既非纯粹文言亦非纯粹白话的浅显文言。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如《搜神记》、《幽明录》、唐传奇、《聊斋志异》等,具有明显诗化和写意性特点,人物描写带一定类型化、“扁平”性,故事叙述、情节结构较为简约明快。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不管是短篇小说《三言二拍》,还是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重在描写情节完整、曲折生动、感人悦人的故事,或着眼悲欢离合,或着眼社会问题,人物栩栩如生,风貌复杂多样,长篇小说更具有一定的史诗品格。文言小说以志怪成就最著,白话小说描写人生成就最高。不管文言还是白话小说,在人物描写、情节布局、构思艺术上,在诗意化和寓意性上,既借力于古代文化特别是古代文学其他样式如诗词辞赋散文戏剧,小说之志怪和传奇、文言与白话,又互相融汇、互相补充、互相借鉴,共同构成中国小说特有的人物创造、构思方法、描写格局、民族特点。



五曰对小说民俗的选择性考察。中国古代小说是中国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而民俗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时代性特点。因为中国古代小说所反映的民俗太复杂,涉及面太广,时间跨度太大,难以专门用一本书进行既细致又全面的研究。本丛书在剖析中国小说发展若干问题时,顺带对小说中的民俗进行综合考究,并选择跟山东有明确关系的几部名著如《水浒传》《金瓶梅》《聊斋志异》《醒世姻缘传》等,对小说所反映的民间信仰、饮食服饰、祭祀占卜、婚嫁丧葬、灵魂狐妖迷信、神佛道观念……进行专门考察,研究这些人生礼俗对刻画人物、组织情节起到的重要作用。作为与汉族民俗的对照,选择《红楼梦》作为满族民俗的载体进行研究。除与汉族类似的饮食服饰、神佛观念外,侧重考察《红楼梦》反映的满族游艺习俗、骑射教育以及满族的蓄奴风俗和与汉族不同的姑娘为尊的重女风俗。通过这个新角度对几部古代小说名著的解读,说明古代小说特别是明清小说中表现的民族风俗是其他任何文学作品和文化典籍都不能替代的。

六曰对小说传播的选择性考察。文言小说的主要传播途径不外乎史家和目录家的著录、读者传抄、类书和丛书收录、戏剧改编。白话小说的传播途径要广泛得多,在传播上也更有代表性和广泛性。印刷取代传抄成为主要传播方式,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作“引”的修髯子、刻印《水浒传》的武定侯郭勋等是小说印刷传播先驱。书坊为降低成本、扩大印刷推出的“简本”小说和短篇小说的选本如《今古奇观》,成为推动小说传播的重要因素。明清两代的文人士大夫成为白话小说的重要接受和传播者,“评点”变成自娱悦人兼推动小说销售的手段,白话小说改编成戏曲也很多见,三国戏、水浒戏、西游戏、封神戏、杨家将戏等广受欢迎。而与广泛传播形成强烈对比、引起尖锐矛盾的是统治者的“禁毁”。其实,中国古代小说很早就传播到欧洲引起世界文豪的赞誉。《歌德谈话录》多次谈到在中国只能算做二流的小说《好逑传》《玉娇梨》等,歌德说:在他们(中国人)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值得注意的是,歌德对中国古代几部二流小说跟《红与黑》等欧美名著持类似欣赏态度。拉美文学两



位当代文学巨匠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都崇拜曹雪芹和蒲松龄，博尔赫斯曾给阿根廷版《聊斋志异》写序并大加赞扬。

七曰古代小说理论发展研究。刘勰《文心雕龙》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文艺理论著作，偏偏没有关于小说的内容，这固然因为当时小说还处于萌芽时期，也说明小说从产生伊始，就没法取得与传统文学如诗词散文平起平坐的地位。小说被列入“子”部，算做“杂家”。“小说”者，小家珍说，雕虫小技也。小说长期处于被歧视的地位，在强大的传统文化笼罩下，小说家总想羽翼信史、向历史学家靠拢，蒲松龄自称“异史氏”，就是司马迁“太史公”的模仿秀。中国古代没有独立的小说理论，也没有系统的小说理论著作，小说理论常以序跋或评点形式依附于小说本身，主要起诱导和愉悦读者的作用，不像经学家说经，诗词学家说诗词，起到写作指导作用。因此中国古代小说评点家对小说创作经验的总结常是“捎带性”的副产品，且多需后世学者加以进一步综合阐释。古代小说理论极力与散文理论、史传文学理论相对接，以取得合法性，其核心理念、内在思路、观念表述多借鉴经史理论，特别是“文以载道”“良史之才”等观念经常被运用。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脂砚斋等古代小说评点家对小说具体人物、情节东鳞西爪的评点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部分吉光片羽的观点甚至可与20世纪文论家媲美。

八曰中国古代小说构思特点。中国古代小说从萌芽到繁荣，经历两千多年，无数作家付出辛勤劳动，它们形成了哪些富有中国特色的构思方法？哪位作家是哪类构思方式的开创者？哪位作家是哪类构思的集大成者？这些构思方法是如何萌芽、成长，并长成一株株小说名作的参天大树？这些形态各异的参天大树又如何共居华夏一园，形成中国古代小说构思千姿百态、摇曳生风的美景？……

这套丛书的写作目的，既想尽古代文学研究者职责，在古代小说研究中拓出新路子，完成新命题，又想古为今用、研以致用，希望通过对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研究的比较全面的检视，使得中国古代小说与西方小说学概念、理论在纸面上接轨、“比武”，让辉煌的古代小说以崭新如新的面貌走向读者，走向世界，引导当代读者阅读，给当代小说创作





者参考。

因为文出众手,每位作者都是此方面默默耕耘多年的专家,各有自认为必须说明之处,故可能本丛书对某些话题和观念,如“小说”词语的历史演变,或有重复涉及,乃或有此书与彼书抵牾之处,读者方家慧眼鉴识之。

古代文化典籍版本复杂,本丛书择善而从,所引用经、史、诗词、小说原文,基本采用权威通行本并在页下加以详注。

众擎群举,十年搏书,敬请读者方家指点。

马瑞芳

2015年6月12日于山东大学



## 绪 论

在西方,“小说进入文学领域,较之诗歌和戏剧这两种古老的文学样式要晚得多,……尽管它的萌芽或雏型可以在古代民间故事、中世纪英雄史诗和骑士故事诗中见到,可是它的最终形成,即作为一种具有独特个性的文学样式,至少要到 18 世纪”<sup>①</sup>。而在我们中国,至迟在两千年前的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小说”一词。《庄子·杂篇·外物》云:

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犗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陷没而下,惊扬而奋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以北,莫不厌若鱼者。已而后世轻才讽说之徒,皆惊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鲋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未尝闻任氏之风俗,其不可与经于世亦远矣!

这里所说的“小说”,虽然与今天文体意义的小说概念尚不全同,但结合上下文看,显然已经具有了今天小说概念

---

<sup>①</sup>〔美〕乔安妮·科克里斯·多洛西·洛根著,王维昌译:《文学欣赏入门》,第 76 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



的某些要素。“因为‘说’在当时，本身就是一个文体概念，包容了议论、记事、寓言等方面的内容，为游士们所时常使用。而庄子称其为‘小说’，则表现出一种轻蔑的感情色彩。”<sup>①</sup>此后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终于成了中国文学园地中的一棵参天大树。然而“与西方小说明显不同的是，中国小说自身分为两个系统，即白话小说和文言小说。它们虽然同属一种文体，然而其各自的产生发展过程、社会属性和艺术观念与特征，以及各自的历史命运等，都有着显著的区别。因此，对它们的研究不应是笼而统之，而应当是区别对待，即在承认并研究二者相互联系的基础上，充分注意它们各自的基本状况和规律特征”<sup>②</sup>。正是基于这一小说史现实，爰有本书的写作。

## 一 文言小说概说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小说自不例外。在中国古代，虽然从语言方面讲，有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之分，但当时似乎并没有从文体学上对二者进行严格的区别，也没有“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的概念。有人说“‘文言小说’的概念最初出现于‘五四’前后，用来区别于白话小说”<sup>③</sup>，好像事实也并非如此。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中，梁启超等人倡导“小说界革命”，众同仁于1903年至1904年在《新小说》第一、二卷上发表《小说丛话》，梁启超即提出“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并称“小说者，决非以古语之文体而能工者也”。他这里所说的“古语”显然指文言，而“俗语”则显然指白话。至1908年，徐念慈（1875—1908年）以“觉我”的笔名在《小说林》第九、十期上发表《余之小说观》，比较全面地分析、研究了小说创作及翻译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始正式提出了“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的概念，并列为专题进行了论述，曰：“六、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且云：“之二者，就今日实际上观之，则文言小说之销行，较之白

① 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编：《中国文学史学史》（第三卷），第230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② 宁稼雨：《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前言》，第1页，济南，齐鲁书社，1996。

③ 李修生、赵义山主编：《中国分体文学史》（小说卷），第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话小说为优。果民国文程度之日高乎？吾知其言之不确也。吾国文字，号称难通，深明文理者百不得一，语言风俗，百里小异，千里大异，文言白话，交受其困。若以臆说断之，似白话小说当超过文言小说之流行，其言语则晓畅，无艰涩之联字，其意义则明白，无幽奥之隐语，宜乎不胫而走矣。而社会之现象，转出于意料外者，何哉？余约计今之购小说者，其百分之九十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其百分之九出于普通之人物，其真受学校教育而有思想、有才力、欢迎新小说者，未知满百分之一者也？所以林琴南先生，今世小说界之泰斗也，问何以崇拜之者众？则以遣词缀句，胎息史汉，其笔墨古朴顽艳，足占文学界一席而无愧色。……夫文言小说，所谓通行者既如彼，而白话小说其不甚通行者又若是，此发行者与著译者，所均宜注意也。”请注意，在反对文言，提倡白话的“小说界革命”时期，文言小说尚且“通行者既如彼，而白话小说其不甚通行者又若是”，就可以想见文言小说独特的艺术特征，以及由此而来的顽强的艺术生命力。

相对于由伎艺性的说话艺术之“话本”演化而来的白话小说，文言小说的首要特征便是使用文言。相对于朗朗上口，通俗易懂，明白晓畅，毫无幽奥之语、生僻之字的白话文，文言文虽有佶屈聱牙、艰涩隐晦、深奥难明之弊，但同时也有言简意赅、简约含蓄、朴素隽永、优雅传神的特色，具有诗化的语言特色。如果说白话小说的叙述与描写如工笔画画家之笔，线条细腻，须眉毕现，具有明显的写实性，那么文言小说的叙述与描写则如写意大师之水墨，勾勒点染，造境传神，具有明显的写意性。举凡优秀的文言小说，如《搜神记》《搜神后记》《幽明录》《世说新语》《聊斋志异》等等，在语言上无不具有这一特点。《世说新语》中卷下《赏誉第八》云：“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王蓝田为人晚成，时人乃谓之痴。王丞相以其东海子，辟为掾。常集聚，王公每发言，众人竞赞之。述于末坐曰：‘主非尧、舜，何得事事皆是？’丞相甚相叹赏。”均三言两语，人物形象即形神兼具，如在目前。若译以白话，恐很难达到如此水平。石昌渝尝云：“中国叙事文学传统，从一开始就有写实和写意两种艺术表现形式，形成两种艺术流派。写实注意情节的完整合理以及细节的周到逼真，而写意则表现着一种诗化倾



向,不注重情节,甚至淡化情节,追求意境,追求意趣的隽永。”<sup>①</sup>与白话文相比,文言文显然更适于写意这一表现形式。

其次,从创作队伍方面讲,白话小说除《金瓶梅》《红楼梦》等文人独创、抒写胸臆的作品外,大多数作品多具有或多或少的“职业”特征。由“说话”四家之“小说”演化而来的“三言二拍”等话本小说,由其他三家演化而来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章回小说,其原作者显然都是民间说话艺人或书会才人。文言小说的作者则主要是传统文人。南北朝时期《列异传》的作者曹丕是皇帝,其他如《博物志》的作者张华,《玄中记》的作者郭璞,《搜神记》的作者干宝,《搜神后记》的作者陶潜,《幽冥录》《世说新语》的作者刘义庆等都是著名文人。唐代的文言小说作者如张鷟、唐临、张荐、薛用弱、李复言、裴铏、袁郊、段成式等都是进士,至于狄仁杰、张说、元稹、牛僧孺等就更不用说了。此后的宋元明清时期,文言小说的作者们虽不及他们的前辈那样显赫,但从北宋的乐史、吴淑、张齐贤、欧阳修,到南宋及金元的洪迈、周密、元好问、陶宗仪,从明代的瞿佑、李昌祺、王世贞、宋懋澄,到清代的蒲松龄、王士禛、纪昀、袁枚等等,无不是知名文人。即使到了近代,像俞樾、王韬、韩邦庆、吴沃尧等等,也仍然入文人之列。纵观历代文言小说作者,可以说主要为文人。从这一角度说,文言小说也可以称之为文人小说。

再次,从篇幅和篇章结构方面看,文言小说虽然也有不少篇幅较长、结构比较复杂的作品,甚至还有少数文言长篇小说,但从总体上看,其主流仍然是篇幅短小的笔记小说和篇幅略长一些的传统传奇小说。确如东汉初年的桓谭所说:“小说家者流,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sup>②</sup>其中,“合丛残小语”一句,便准确地道出了大多数文言小说篇幅简短、结集行世的形式特征。而这一特征也同时确立了作家们顺其自然的结构意识,因而大多数文言小说的结构都比较简单,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从而形成了长短随宜、长短结合的形式体例。以《世说新语》为例,短者如下卷《俭嗇第二十九》之

① 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第85页,北京,三联书店,1994。

② 〔汉〕桓谭:《新论》,文见中华书局影印胡克家本《文选》卷三一江文通杂体诗《李都尉从军》李善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





“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仅一句话，十六个字就把王戎的俭啬刻画得淋漓尽致。长者如《假谲第二十七》之“温峤娶妇”等，亦仅百余字。另如《聊斋志异》，短者仅几十字，长者如《罗刹海市》《念秧》等也绝不超过五千字，然而却能做到故事情节迂回曲折、引人入胜，人物形象血肉丰满、生动感人。这在白话小说，恐怕是很难做到的。篇幅往往与小说的结构有关。今天，小说史研究者在文体分类方面多将文言小说分为二类，即笔记小说和传奇小说。然而如果换一个视角，从结构模式方面分，则似乎可以分为三类，即笔记体结构模式、传记体结构模式和编年体结构模式。笔记体结构源于上古史官之记言记事，是所有叙事散文的基本元素。这一结构模式不注重故事情节的完整或人物的生平经历，而是选取人物生平中的某一片断，日常生活中的某一场面，像影视中的特写镜头一样，突出重点，不及其余，使人物某一方面的个性特别突出。笔记小说中的绝大部分，传奇小说中的“记体传奇”（《古镜记》《三梦记》之类），都属这一结构模式。传记体结构模式（或称纪传体）起源于《左传》，滥觞于《国语》，在《战国策》中得到长足的发展，至《史记》已经成熟。<sup>①</sup> 这一结构模式的特点是以人物的生平为叙述的主线，将人物一生的重大事件和最足以表现人物思想性格的情节和细节贯串成篇，可以说是一种以人系事的结构模式。一部分史传小说，如《汉武帝内传》《赵飞燕外传》，传奇小说中的“传体传奇”（《莺莺传》《李娃传》之类），都属于这一结构模式。编年体结构模式始于《春秋》。这一结构模式的特点是叙事以时间为顺序，按照时间的先后叙述故事的发展和经过，以时间为线索安排故事情节，可以说是一种以事系人的结构模式。一部分史传小说，如《燕丹子》《吴越春秋》，一部分传奇小说，如《开河记》《迷楼记》等，都属于这一结构模式。总而言之，因为大部分文言小说篇幅较短，所以结构也相对简单，

<sup>①</sup> 《左传》自庄公二十八年至僖公三十二年间志晋公子重耳出亡，不仅客观地记叙了事情的经过，而且写出了重耳从一个年幼无知的贵族公子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前后变化，已露传记体结构模式先声。《国语》之《越语上》记勾践灭吴，《越语下》记范蠡佐勾践灭吴，已初露传记体结构模式。唐刘知幾《史通》论及这一结构模式的渊源，称“寻兹例草创，始自子长（司马迁）”。但《史记》中的许多篇章，内容和形式上都直接受《战国策》的影响。如《刺客列传》中的豫让、聂政、荆轲等传记，实即增删《赵策一·晋毕阳之孙豫让》《韩策二·韩傀相韩》《燕策三·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而成。其他如《齐策四·齐人有冯谖者》等，实已具“纪传体雏型”。



不像白话小说中的长篇章回小说那样复杂。

从叙述模式方面讲,文言小说也与白话小说有着明显的区别。从人称方面讲,白话小说源于说话艺术,所以多为第一人称讲述式叙述,总是有一个说书人介于小说的故事、人物和读者之间,充当着叙述代言人的角色。而文言小说源于史官文化,是文人作为故事的旁观者的记录或追述,所以多为第三人称呈现式叙述,读者可以直观地通过隐蔽的叙述代言人的第三人称客观叙述,直接面对作品的故事和人物。因为说话人往往在讲述中直接地介绍人物,评价人物,阐述故事的主题和旨意。“以上古隐奥之文章,为今日分明之议论。……言其上世之贤者可为师,排其近世之愚者可为戒。”<sup>①</sup>所以白话小说多为主观讲述式叙述。文言小说的作者多为文人,深受传统史官文化的影响。而中国史官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尚实,所以文言小说,尤其是其中的笔记小说,作者大都秉笔直书,在叙述过程中一般不直接站出来进行议论,陈述自己的观点,而是客观地将故事情节和人物言行呈现在读者面前。因此从感情介入方面讲,文言小说多为客观呈现式叙述。白话小说的叙述代言人——说话人在讲述中可以任意发挥,既可以描述人物的心理活动,也可以描述人物的种种隐私,既可以讲述故事的前因后果,也可以预叙故事的结局,所以白话小说都是全知视角的叙述。文言小说则不然,虽然也有少量全知视角的作品,但绝大多数是文人作为冷静的旁观者的叙述,所以多是限知视角的叙述。甚至像蒲松龄这样的大家,因为《聊斋志异》中出现了全知视角的叙述而遭到了另一位文言小说大家纪昀的批评。<sup>②</sup>综上所述,可见与白话小说相比,文言小说基本上是一种第三人称客观呈现式限知视角的综合叙述模式。

“艺术家的根本任务却是塑造形象,尤其是塑造出血肉丰满的人

① [宋]罗烨:《醉翁谈录》甲集卷一《舌耕叙引》,第2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② 纪昀门人盛时彦《姑妄听之跋》引纪昀语曰:“《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虞初以下,干宝以上,古书多佚矣。其可见完帙者,刘敬叔《异苑》、陶潜《续搜神记》,小说类也。《飞燕外传》《会真记》,传记类也。《太平广记》,事以类聚,故可并收。今一书而兼二体,所未解也。小说既叙见闻,既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伶元之传,得诸樊姬,故猥琐具详。元稹之记,出于自述,故约略梗概。杨升庵伪撰《秘辛》,尚知此意,升庵多见古书故也。今燕昵之词,嫖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又所未解也。留仙之才,余诚莫逮其万一。惟此二事,则夏虫不免疑冰。”



物,用以表达他的主题——他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sup>①</sup>英国著名小说理论家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在他的《小说面面观》里,将小说中的人物分为两类——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并说:“17世纪时,扁平人物称为‘性格’人物,而现在有时被称作类型人物或漫画人物。他们最单纯的形式,就是按照一个简单的意念或特性而被创造出来。”<sup>②</sup>从这一方面看,中国文言小说中的人物无疑大都属扁平人物。这一方面是因为文言小说篇幅简短,故事情节相对单一,很难塑造性格相对丰满,并在故事进展中有所发展的圆形人物,而更重要的是作者主观上就没有想写人物的全部,而是重点突出人物性格的某一方面而不及其余。这一点在“世说体”志人小说中尤为明显。《世说新语》全书分为三十六门,其细目如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等等,每一门写某一类型的人物,这些人物无疑都是性格单一的扁平人物。然而也正因如此,这些个性突出的扁平人物却给历代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而造就了作品的不朽价值。这恰如福斯特所说:“扁平人物的一大长处是容易辨认,他一出场就被读者那富于情感的眼睛看出来。……第二个长处是他们事后容易为读者所记忆。由于他们不受环境影响,所以始终留在读者心中。……即使他们所在的那本小说会销声匿迹,但他们仍然不被人遗忘。”<sup>③</sup>这种人物特征再加上文言特有的语言特征和文言小说的写意手法,更使文言小说具备了它独特的审美特征——情趣审美。也就是说,文言小说不像白话的话本小说那样依靠诸如悬念、强烈的故事性动人,更不像白话的长篇章回小说那样依靠生动曲折、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和具有丰满性格的圆型人物动人,而是依靠它本身的诗情画意,依靠它所塑造的类型化、漫画式扁平人物的生动性、典型性,依靠种种扁平人物所体现的喜剧效果,亦即种种情趣动人。时至今日,吃鸡蛋的王蓝田、坦腹东床的王羲之、能写屁颂的秀才以及蒲松龄笔下的各色人物之所以仍能脍炙人口,想来原因就在于此。今天,手机短信故事的悄然兴起,从审美层面讲,恐怕原因也在这里。

①〔美〕乔安妮·科克里斯、多洛西·洛根著,王维昌译:《文学欣赏入门》,第111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

②③〔英〕爱德华·摩根·福斯特著,苏炳文译:《小说面面观》,第59~60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除上面论及的语言、作者队伍、篇幅与结构、叙述模式与叙述方法等方面之外,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还有多方面的不同,足以确定它在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上的文体地位。美国著名汉学家韩南在其《早期的中国短篇小说》一文中便首列“白话小说与文言小说”一节,专论二者的不同,称白话小说与文言小说的“主要区别不在文言小说与白话短篇小说之间,而在文言小说与所有白话小说之间。其间相异之处较体裁之别更为基本,事实上涉及故事叙述的方法,而选用某一种文字——文言或白话,仅仅是整套叙述方法中许多要素之一而已”<sup>①</sup>。他还运用布斯《小说修辞学》的理论,从三种叙述语态——评论式、描写式、表达式三个方面分别进行了论述,特别指出文言文常与隐晦的小说修辞法一同出现,而白话文则常与明确的修辞法不分。另外,二者在模拟时空方面也有着显著的不同。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读者自可参阅。

## 二 文言小说的发展历程

我在拙著《中国小说发展史概论》中,结合各类小说文体的发展历史,将整个中国小说发展史划分为七个时期:一、中国小说的孕育时期(先秦),二、中国小说的产生暨雏形时期(两汉),三、笔记小说的成熟和史传小说的发展时期(魏晋南北朝),四、文言小说的全面成熟和通俗小说的产生时期(唐五代),五、中国小说的通俗化时期(宋金元),六、中国小说的雅化时期(明清),七、中国小说的变革时期(近代以降)。文言小说作为中国传统小说的主要文体,虽然有它的特殊性,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和演变轨迹,但其发展历程大致也可以划分为七个大的历史时期。

### (一) 孕育时期(先秦)

中国文言小说虽然不像西方小说那样,延迟到18世纪才作为一种具有独特个性的文学样式出现,但相对于诗歌和散文来说,仍然要晚得多。关于中国小说的起源,自古以来即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或云

---

<sup>①</sup>〔美〕韩南:《早期的中国短篇小说》,见王秋桂等译《韩南中国小说论集》,第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